



现代社会学文库

文化与谈判

CULTURE AND NEGOTIATION

—— 解决水争端

〔法〕居伊·奥立维·福尔

〔美〕杰弗里·Z·鲁宾

主编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翻译组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现代社会学文库



CULTURE AND NEGOTIATION

——解决水争端

[法] 居伊·奥立维·福尔

主编

[美] 杰弗里·Z. 鲁宾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翻译组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与谈判/[法]居伊·奥立维·福尔、[美]杰弗里·Z. 鲁宾主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翻译组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5

(现代社会学文库)

ISBN 7-80149-529-2

I. 文… II. ①居…②杰…③联… III. 文化—背景—影响—谈判—研究 IV. C912.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17826号

现代社会学文库

文化与谈判——解决水争端

主 编:[法]居伊·奥立维·福尔 [美]杰弗里·Z. 鲁宾

译 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翻译组

责任编辑:程晓燕 杨 稚

责任校对:金洪荣

版式设计:辛 诤

责任印制:同 非

出版发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电话 65139964 邮编 100732)

网址: <http://www.ssdph.com.cn>

经 销: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排 版: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北京四季青印刷厂

开 本:850×1168毫米 1/32开

印 张:8.75

字 数:190千字

版 次:2001年5月第1版 2001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149-529-2/D·081

定价:18.00元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01-1108号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Edited by Guy Olivier Faure, Jeffrey Z. Rubin

Culture and Negotiation – The Resolution of Water Disputes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Applied Systems Analysis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授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全球中文版独家专有权。

此书得到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
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



联合赞助



编辑委员会

居伊·奥立维·福尔 (Guy Olivier Faure)

维克多·A. 克雷蒙尤克 (Victor A. Kremenjuk)

温弗雷德·兰格 (Winfried Lang)

格纳·斯约斯特 (Gunnar Sjöstedt)

杰弗里·Z. 鲁宾 (Jeffrey Z. Rubin)

I. 威廉·扎尔特曼 (I. William Zartman)

献给

Anne, Aurelia, 和 Elise Faure 及
Carol, Sally, David, 和 Noah Rubin

总 序

承蒙社科文献出版社之邀，为《现代社会学文库》作序，本人自觉才疏学浅，深感惶恐。

今年是戊戌变法百年纪念，也是北京大学百年纪念，中国早期现代化肇始的许多制度化标志都发生在百年之前的 1898 年后，中国的社会学亦然。1895 年严复发表了《原强》，把西方的社会学思想融合为他自己的群学思想；1897 年严复把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 1873 年著的 *The Study of Sociology* 一书译成中文，冠名为《群学肄言》；1895 年前后，根据梁启超的记载，康有为在广州长兴学舍（万木草堂）设立了群学的课程。如果以这些事情作为社会学在中国产生的标志，那么中国的社会学就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而若以 1910 年京师大学堂（1912 年改为北京大学）开设社会学课程作为中国社会学学科化的标志，那也已经有 88 年了。社会学在中国的产生，实际上是西学东渐和中西文化碰撞、融合的结果。社会学导入中国的过程，与现代的器物、制度、思想和文化导入中国的过程是同步的，可它一经导入和产生，就完全被纳入中国的文化话语系统和观念系统，而作为新思想的种子，它也在改变着这一话语系统和观念系统。

社会学导入中国，不仅仅是作为一种理论，一种思想或一种方法，也是作为一种学术制度，就像与其同期导入中国的学堂、

船政、邮电、铁路、银行、矿务等等制度形式一样，都是早期现代化的制度符号。社会学的导入中国，使中国学者对于社会现象的研究跳出了一般性现象分类和大一统混沌解释的方法羁绊，走上了从具体现象的归纳出发寻求背后的因果规则的实证道路。

梁启超在他 1923 年演讲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对中国学术开始转向务实的思潮追溯得更远。他认为近三百年“厌倦主观的冥想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察”的时代学术思潮，是对过去六百年道学传统的反动。蒋方震更把“由主观之演绎进而为客观之归纳”，概括为堪与欧洲文艺复兴相媲美的“清学之精神”（《清代学术概论》序）。无论走向实证的学术取向乃中国所固有还是西学之东渐，中国广泛开始按一定方法进行的社会调查，却的确是在社会学导入中国以后的气象，并非中国传统治学文化的土壤里自然生长出来的。中国的学者那时才幡然省悟，原来在楼阁里谈论的学问，也是需要通过对其日常生活的观察来检验的。

作为社会学主要研究对象的社会行动结构；实际上就是日常生活的基层结构，它的变迁是每日每时都在进行的，它是由无数的、似乎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但又实际上变动不居的日常社会行动构成的。这种持续的不间断的社会结构变迁是社会发展的常态，只不过有时缓慢得让人感到死气沉沉，有时又加速得让人感到变幻如云、不知所措。社会学所研究的、所关注的、所要通过社会调查获得的学问，实际上就是关于这种日常生活基层结构的变化规则的知识。这种知识除了来自对日常生活经验的分析综合之外，别无他途。

这种做学问的方法，并不只限于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在历史研究的领域，这一方法也同样有效。法国著名历史学家 F. 布罗代尔（1902~1985）在研究 15~18 世纪物质文明、经济和

资本主义时，就特别注重从最基层的日常生活结构的变化入手，他不厌其烦地从各种琐碎的关于衣食住行的资料中去发掘那些人们所不经意的东西，认为这样才能真正揭示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形成。这样撰写历史当然不如研究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的传统历史方法简洁，甚至让人觉得把轰轰烈烈的历史写得那么平常乏味、那么枯燥繁琐，但这样撰写的历史也许才是更为真实的、更接近历史本来面目的。中国是史学大国，但对中国的历史、史学家更多关注的是正史（“二十四史”）和编年史（《资治通鉴》等），而不是各种历史档案本身。对中国“二十四史”，史学家历来关注的也是本纪、帝纪、列传、世家以及王朝更迭等重大事件。近现代治史的学者，才把目光更多地转向考古发掘的和历史遗留的实物，注重引证和依据第一手资料，也更注意研究史书中反映日常生活的食货志、刑法志、地理志、礼仪志、乐志、艺文志、职官志、舆服志、选举志等等。

20 世纪初社会学在中国的导入和产生所推动的学术走向生活、走向实践的取向，以及外辱内忧之下学者所形成的富国强国的强烈使命感，形成了中国社会学的介入生活、干预生活的传统，推动一大批学者走出书斋步入生活基层。但是，学术走向生活、走向具体和走向个别的惯性和偏好，也容易形成两个学术上的弊端：一是对理论的轻视以及由此造成的理论上的匮乏；二是在研究中国或研究中国的某个地区、某个村落时，过分地强调其文化价值的“特殊性”，而与现代性的普遍性断裂。

改革开放后中国恢复社会学以来，中国的社会学研究在中断约 30 年后又迅速地发展起来。一个国家的经济快速起飞和社会加速转型的现实，对社会学的研究形成强烈的刺激。近十几年来，中国的社会学家们进行了大量的社会调查，参与了很多社会

现实问题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的资料，但在理论上有分量的建树，仍告阙如。

中国社会学要在理论上有突破性的进展，必须以人类关于社会变迁和社会发展的共同的知识财富为基础，积极参与国际社会学界共同的知识积累过程，系统而全面地了解国外社会学发展的各种趋势，把握住国际上社会学研究的理论前沿问题。要善于理解和辨析各种不同的理论学派观察社会现实的视角和方法，无论这种理论学派是实证的抑或解释的，是结构决定论抑或理性选择论。因此，及时地翻译和介绍国外社会学的著作，特别是翻译和介绍国外社会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就成为中国社会学走向理论上的成熟和参与国际学术界的一项基础性工作。目前，信息技术和知识经济的发展正在以出人意料的速度迅速地改变着世界的面貌，很可能会使社会的产业结构、职业结构、组织结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都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并对社会学的理论思考和研究方法产生重大的影响。中国社会学也应密切跟踪和了解这种新的变化趋势。

学习国外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当然要与研究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那些紧迫问题结合起来。社会学作为一门介入生活、改良社会的应用学科，从它诞生的时候起，它的发展就是始终与对进步和秩序问题的关注密切相联的。然而，每个国家的社会学，并不能因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而具有学术上的特殊性，更不能因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而在学术上实行排他主义。社会学可以有许多不同的学派、不同的命题和不同的思潮，其研究对象可以具有时间和空间的巨大跨度以及文化上的巨大差异，但属于这个学科的基本假设、基本逻辑和基本规则是相同的，使用的学术语言和学术概念是共同的。

中国社会学目前在理论上的苍白，固然与社会学在中国内地近 30 年的研究中断不无关系，但独坐寒窗者日少，短平快的研究日多；理论的反思少，观点的炒作多；长远的知识积累少，赶时髦的时兴之作多；欣赏别人成果者少，自以为是者多……成就和功利目标发生如此转向，也是至关重要的原因。

大学里的莘莘学子，通过老师和学兄之口，一代又一代地传咏着王国维对苦涩的治学道路所给予的诗意般概括：“古今成大事业大学问者，不可不经历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界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界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界也。未有不阅第一、第二境界而能遽跻第三境界者。”可见做大学问，要具有“回头蓦见”的功夫，就非要有“独上高楼”的勇气和“终不悔”的决心才行。

但愿这套包括研究中国现实问题和国外译著两个系列的社会学文库，能够成为中国社会学走向更加成熟的见证，记录下中国社会学新一代学人努力建树理论命题和丰富学术积累的真实足迹。

李培林

1998 年初夏于北京月坛

序

我高兴地向大家推荐这部关于文化和谈判的书，这是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IIASA）的合作成果。教科文组织感谢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邀请了一批作者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论述这个重要而复杂的课题。

现在，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文化对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对发展目标的选择和实现都有普遍的影响。以教科文组织挂帅的“世界文化发展十年”（1988～1997年）的宗旨之一就是促进在发展工作中考虑文化问题以及强调和丰富各种文化特性。当代明显的全球化趋势更突出了认识和滋养人类不同的文化根源的重要性。我们既要有个人归属感，又要与世界各国人民共处，既要有全局观点，又要考虑局部的特点，这正是我们这个世界面临的艰巨任务之一。

这项任务在环境领域尤其艰巨，因为保护本地的利益与关心全球是分不开的。此外，要综合地考虑问题，就不能局限于某一个领域，环境方面的问题与各种发展问题，包括某些发展工作所要达到的文化目的，都是密切相关的。除了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达成的各项具体协议，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最重要的成就是树立了强调文化多样性的全球大团结这一观点。

里约高峰会议本身就表明人类在协调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时

谈判是多么重要。此次会议开始时有北—南对抗的危险，但通过长时间的讨论，取得了基本共识，并就一些极其重要的问题达成了协议。国际社会要加强和扩大里约协议，千秋万代造福人类，这样的外交谈判非常重要。从更普遍的意义上讲，如果我们要从战争文化引起的冲突和对抗走向真正的和平文化，就必须在社会各个层面上重视谈判技巧，促进文化了解和合作精神。

文化因素如何影响国际谈判，这显然是个重要的课题，尤其是在环境领域，因为这里的问题又多又重要，而且迫切需要解决。在我看来，这本书的特点在于既对有关的问题和概念作了清晰和全面的分析，又有关于某些河流以及在这些河流以及在这些河流和支流的两岸居住和生产的人民的实例研究。它有趣地说明了使人们意见一致或意见分歧的文化原因，在谈判艺术方面提供了有益的和实用的指导，也指出了今后开展研究的方向。

实际上，文化可以是桥梁，也可以是障碍。在当今这个现代通讯手段大大缩短了空间距离、资源不断减少、人口猛增、环境问题日趋严重的世界上，为了生存和发展，人们必须相互谅解，同舟共济。我们必须像刘易斯·芒福德在其《人的状况》一书中所说的那样，不要“固步自封，重蹈覆辙”。我们必须敢于通过改变我们对自己与他人和与自然界的关系的看法，来改变自己。我们是否愿意和是否有能力通过谈判达成协议是衡量我们在这方面是否有进步的重要标志。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费德里科·马约尔

前 言

这本书最初是在美国出版的。它在读者中引起的兴趣使教科文组织决定将其译成中文。这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原因有几个方面。现在，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了。中国与世界上许多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建立了大量经济和社会联系，包括贸易、技术转让、合资企业等。中国已经接受许多国家的投资。官方已经批准了 30 多万个合资企业。如此大规模的经济交流意味着要进行大量的谈判，来调整各种需求。作为发展长期贸易关系的第一步，为将来的合作打下坚实的基础，谈判是十分重要的，是关键。谈判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任何中外合作项目中，双方都必须十分注意谈判。但是，尽管在执行开放政策的 20 年中积累了许多谈判经验，在这一漫长而艰巨的调整过程中，仍然出现了各种问题。许多问题并非源于利害冲突，而是由文化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如因用词不当引起的误解，但多数情况下，误解产生于对同一问题的不同理解，价值观和信仰上的差异，认识上的不一致，有时还有个性问题。

必须增进对谈判的了解，从而提高谈判的效果，这方面的原因也很多。对中国和外国来说，在很好地提出需要共同解决的问题之后如何进行有效的谈判和找到令双方满意的解决办法，这显然是大家都感兴趣的问题。

西方出了许多有关这些问题的出版物，有些是由本书的撰稿人写的。教科文组织和我们都认为把这些研究成果介绍给广大的中国读者是十分有益和必要的。

这本书引起广泛兴趣的另一个原因是它以河流及其使用权为选题，而水的问题，无论是在经济、政治还是环境方面，都是下一个十年的重要谈判内容。《文化与谈判》一书所作的全面阐述使读者有机会看到迄今为止很少发表过的第一手资料。它可以丰富读者的知识，提高谈判者的谈判技巧。

对水问题没有兴趣的人也会发现本书对他们同样大有裨益，因为本书的一些结论适用于各类谈判，尤其是涉及与外国人的商业、合资企业和各种社会关系的谈判。

眼睛看不到却与我们形影不离的是什么呢？一切均已忘却，惟独它依然存在，而且深入到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以至我们未必察觉得到的又是什么？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当然都是文化。

就在人们提出这样抽象的谜语时，世界已变小，人们也更加相互依赖。新的和惊人的传播工具和交通工具使得思想和人都能够更容易地抵达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同样，老的政治分野也以惊人的速度消失了（如象征冷战时代结束的柏林墙的倒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又一个跨国经济实体。中国实行的开放政策大大促进了与外国的交流，也大大增加了有关贸易、技术转让和建立合资企业的谈判。此外，我们也不能忘记环境问题造成的全球性危机。

这些情况，不管是单独的还是合在一起，使得国际大家庭的成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相互依赖，从而产生两种不可避免和非常重要的结果。首先，它更加突出了民族文化，而不问在日益相互依赖的世界上文化究竟是更重要了还是更不重要了。日趋增

强的相互依赖可能会导致超出文化范围的关系，也可能使各方更注意文化的区别作用。第二，全球相互依赖性越强，我们这个不断缩小的世界就越可能发生冲突。另外，如果战争已不太可能再被用作解决冲突的手段的话，那么外交和谈判也许比以往更加重要了。

这个问题难就难在要用文化这样一个又复杂又多变的概念去解释文化是如何影响国际谈判的方式与结果的。文化经常影响谈判，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其他许多因素也对谈判产生影响。因此，我们更需要了解的是文化如何为解决争端创造意想不到的机会和给达成协议构成障碍。

文化常被作为谈判失败的借口；当以其他理由解释不通的时候，最后总可以靠文化来解释。因此，我们更有必要弄清这个来自圆其说和搞政治化的捉摸不定的概念。本书的目的就在于此，我们希望用一个文化发挥重要作用的共同领域来说明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一个有明显特点，又比较重要而且文化又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国际冲突作为我们的例子。

我们最终选定了水资源冲突，特别是有关河流的争端。河流冲突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较容易识别和说明。我们希望尽量结合这些共同特点突出说明文化的微妙影响。除此以外，我们谈的河流冲突问题也是一个对全球的经济和环境具有重要和实际意义的领域。

当本书的编委会第一次开会讨论是否有可能编一本有关文化与谈判的书时，讨论非常热烈。有人认为文化对了解谈判是十分重要的，另一些人认为文化的影响受到大量具体情况的制约，还有一些人则认为文化虽然能产生重要影响，但这种影响并非来自民族差异，而是来自具有一种特殊的共同文化的职业谈判家和职